

谢祥皓 谢德 著

孙子兵法

十日谈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十日谈

孙子兵法

谢祥皓 谢德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子兵法十日谈/谢祥皓,谢德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5

(思想文化十日谈丛书)

ISBN 978 - 7 - 5326 - 3347 - 0

I. ①孙... II. ①谢... ②谢... III. ①兵法—中国—春秋时代②孙子兵法—研究 IV. ①E89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8725 号

责任编辑 朱伟明

装帧设计 姜明

思想文化十日谈丛书

孙子兵法十日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0.75 插页 1 字数 136 000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3347 - 0/B · 191

定价:21.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2431119



目 录

引言	中国上古时代文化发展的两条主线与三大圣哲	(1)
一、	五千年中华文化的起始在伏羲氏时代	(1)
二、	五千年文化之文字传承确凿有据	(2)
三、	礼与兵，是黄帝以来文化发展的两条主线	(4)
四、	春秋后期三大圣哲——老聃、孔丘、孙武	(5)
第一日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8)
一、	从黄帝“修德振兵”说起	(8)
二、	三代以来“以礼治军”的基本史实与理论总结	(11)
三、	春秋以降“变诈之兵并作”	(18)
四、	承前启后集古今之大成——《孙子兵法》诞生	(24)
第二日	从“赐姓孙氏”，到“千里伐楚”	(26)
一、	陈完奔齐，田氏初立	(27)
二、	孙书伐莒，赐姓封邑	(28)
三、	孙武出生，避乱奔吴	(29)
四、	献书拜将，千里伐楚	(34)
第三日	从“十三篇”到“八十二篇”	(42)
一、	成书于吴	(42)
二、	厚积于齐	(44)



	三、从“十三篇”到“八十二篇”	(48)
	四、曹操对传承《孙子兵法》的独特贡献	(52)
	五、宋代之后的两大流传系统——《武经七书》与 《十家孙子会注》	(54)
第四日	旷古绝今的兵学理论体系	(58)
	一、何以称“旷古绝今”	(58)
	二、《孙子兵法》十三篇分篇要旨	(59)
	三、五大逻辑层次	(65)
	四、纵横勾连、环环相扣、系统完整的理论系统	(66)
第五日	《孙子兵法》十大战略原则	(72)
	一、《孙子兵法》的灵魂——战略思想	(72)
	二、《孙子兵法》十大战略原则	(74)
第六日	孙武兵经，辞如珠玉	(89)
	一、策略花絮	(90)
	二、战场风云	(95)
	三、治军风采	(101)
	四、要义重申	(103)
第七日	孙臆对孙武思想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105)
	一、今存《孙臆兵法》的由来	(106)
	二、孙臆对孙武军事思想学说的自觉继承	(107)
	三、“孙氏之道”的弘扬与拓展	(109)
	四、孙武、孙臆的唯物主义精神	(111)
	五、孙武的辩证法思想	(114)
	六、孙臆对孙武辩证法思想的发挥	(116)



第八日	檀道济、戚继光对孙子兵法的独特贡献·····	(120)
	一、檀道济的主要贡献·····	(121)
	二、戚继光的精心实践与理论创新·····	(128)
第九日	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	(133)
	一、前孙子者，孙子不遗·····	(133)
	二、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	(137)
第十日	《孙子兵法》光照环宇·····	(150)
	一、世界兵学第一人·····	(150)
	二、日本的孙子学·····	(151)
	三、《孙子兵法》传入其他东方国家·····	(159)
	四、《孙子兵法》对西方国家的传播与影响·····	(160)
后记	·····	(164)



引 言

中国上古时代文化发展的 两条主线与三大圣哲

英国19世纪著名学者汤因比指出，在近6 000年的人类文明史中，曾经出现过26种文明形态；其中，唯独中国文化历经五六千年从未中断，延续至今。究其原因，除去中国得天独厚的独特地理环境作为外部条件之外，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五千余年前后相续的文字传承。

一、五千年中华文化的起始在伏羲氏时代

“中华文化”的起点在何处？在于中国“文字”的起始，在上古圣哲伏羲氏时代。

世传“仓颉造字”，仓颉为黄帝的史臣，似乎文字应起始于黄帝时代。其实更早。先秦儒学大师荀卿有言：“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荀子·解蔽》）就是说，古代喜欢造字的人很多，并非仓颉一人，亦非始于仓颉，只是由于仓颉所造之字性理专一，不易淆乱，故能独传后世。而仓颉之造字，基本思路与规律就是“象形”，“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说文解字叙》）。大致由形象思维略加归类条理而已。



先于仓颉而存在的象形文字，并非罕见，如，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口陶尊上所画的花纹，约有数十个形态，其中一幅类似于“山上日出”的花纹，即被近代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释为“旦”字，即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些陶尊的烧制年代，距今确有五千余年。又如，山东邹平的古陶纹，西安半坡的古陶纹，时间更早。

真正具有理性思维意义的文字创造，当推伏羲之“八卦”。按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的说法，伏羲创制八卦，就在于为天地自然的运行变化，高悬一个可以预测的法则。它不但以阴（--）、阳（—）两种爻画展现了天地万物生息变化的根本动力，而且又以阴阳爻画的八种组合形态，具体表现了天、地、火、水、风、雷、山、泽这八种最常见的自然现象或物质形态，由此，“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系辞下》）可见，伏羲之创“八卦”，不但是以理性创造文字的起始，更由此开启了对天地自然之运行规律的探索。称伏羲为中国文明的开创者，为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第一人，他是当之无愧的。而且，他当时的思想高度，远远超越了同代人。

二、五千年文化之文字传承确凿有据

伏羲之后，影响最大的就是神农与黄帝了。《易·系辞》言：“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这就是中国上古的“三皇”、“五帝”时代。黄帝为“三皇”之末，为“五帝”之首，即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而黄帝之后，颡项、帝喾、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秦的先人等，都是黄帝的裔孙，故黄帝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尤为突出。

20世纪20年代以来，曾有一股影响很大的思潮，认为中国上古时代东周



之前无信史，认为“三皇”、“五帝”都是“传说”中的人物，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前两千余年均视为“传说”时代，这种观点至今充斥在各类工具书及教科书之中。在此，不得不多用些笔墨确证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文字传承的连续性与确凿性。

中国自文字产生以来，就有谱牒记事以备传承。西周初年，周公主持制定《周礼》，其“外史”之职，就“掌三皇五帝之书”。依郑玄注，“三皇”之书谓之《三坟》，“五帝”之书谓之《五典》。这表明《三坟》、《五典》当时确实存在。如无其书，如何“掌管”？

时至春秋后期，这些典籍依然存在。《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记载：

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依西汉孔安国及唐代孔颖达的注解：《三坟》是伏羲、神农、黄帝“三皇”之书，《五典》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五帝”之书。正是因为这些典籍存在，左史倚相才有可能“读”。又，孔子“序书传”，所据亦为上古文献，今存《尚书》就是孔子依据当时存世的典籍编订的。故唐人魏徵称：“《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隋书·经籍志》）

不仅如此，这些典籍的存在实已延续到西汉初年。司马迁为撰写《太史公书》（即《史记》），曾阅读了大量的国藏典籍，其中就包括“三皇”之书。司马迁说：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史记·三代世表》）

“谍”即“牒”，记载帝王世系之书。黄帝之前，有记载，但无年数，自黄帝起，乃有具体“年数”的记录。司马迁就是依《五帝系谍》等为据，编撰了《三代世表》。

其后，班固撰《汉书·古今人表》，同样是“自书契之作，先民可得而



闻者”而制作的。《古今人表》所记第一人，就是“太昊帝宓戏氏”。“宓戏”即“伏羲”。

史籍载录，充分、确凿，多家并同。如果今人由于自身没有见到《三坟》、《五典》等竹木谍记，就妄称上古人物皆为“传说”，公然否定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文字传承，岂非太荒唐了！试问，当今时代有几人能看到宋版之前的典籍？难道唐宋之前的文化你都不承认？要相信古代典籍的记载是确凿的。

三、礼与兵，是黄帝以来文化发展的两条主线

周公与姜太公为这两条线索的集大成者。

中国上古的礼制，渊源甚早，最初为神权时代人们事神祈福的一种实践活动。许慎《说文》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通过对神灵的祭祀，以求取人间的福祉。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三代，大致都是神权统治，占卜与祭祀活动，几乎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成为“礼之三本”。（《史记·礼书》）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笼罩于“礼制”的各种规范之下。西周初年大政治家周公，“制礼作乐”，所定《周礼》，成为国家大政的根本大法；所定《仪礼》，则是规范社会各阶层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及各类社交活动的基本准则，周公也由此被后人尊为“至圣”（直至唐代，唐太宗才改封孔子为“至圣”）。对于礼制的发展与繁盛，孔子曾一方面惋惜夏、殷礼制文献的不足，又盛赞“周礼”之丰富：“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由于上古三代礼制、礼学成为指导社会生活的主流文化，成为一切是非标准的最高裁决者，故儒学大师荀卿又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

在礼与礼制控制族群内部生活的同时，族群间则常用兵。



远古人类生活的第一要务，就是为生存而斗争。他们要寻找食物，寻找栖息处所，要向自然界的各种生存威胁进行斗争，要建立一个适于群落生存的环境。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族群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易传》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系辞下》），就是早期的人类战争。至“三皇”时代，这种战争已颇具规模，并且成为氏族部落维系生存环境的重要手段。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黄帝战炎帝于阪泉之野，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就是当时著名的战争。此时的战争已经具备两条最基本的要素：道义与武力，就是轩辕帝的“修德”与“振兵”。其后，战争的基本形态，就是以道义为旗帜，以武力为后盾，用强力手段来达到政治目标。黄帝之后，尧攻驩兜，舜伐三苗，夏攻有扈，汤伐夏桀，都是十分有名的战争。至殷末，武王伐纣，则将这种战争形态推向了极致，同时，也造就了最早的兵学大家——姜太公。

姜太公先助西伯昌（周文王）脱离羑里，继而与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后助周武王伐纣，由于“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录《太公》237篇，即“《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后世所传《六韬》、《三略》，皆为其中的内容。由是，姜太公被后世兵家奉为“武祖”。

四、春秋后期三大圣哲——老聃、孔丘、孙武

春秋后期，中国文化已经经历了千余年的开拓与发展，生存斗争的各种



实践，都在促进中国人民的经验积累与智慧开拓。

此时的中国社会，正面对着三大难题：处于第一位的，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生存，如何让大自然容纳人类，养活人类。其次，是人类群体内部的自我调节，必须遵循什么样的基本伦理，人类才有可能维系自身的群体延续。其三，面对人类社会内部的部族斗争、阶级斗争、集团斗争，需要遵循怎样的规律，才能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在这三大领域，历史的经验与才智，造就了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无与伦比的三大圣人：老聃、孔丘、孙武。

老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主要贡献，在于撰著《道德经》；其思想学说的精义，在于天道自然，调理天人关系，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是老子关注的焦点。既然天地万物以及人类，都依顺天道自然规律而衍生，因此，天道规律就成为不可违逆的最根本的规律。“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然而归根结底还是“自然”为大。因此，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准则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道法自然”一语，乃老子思想学说的灵魂所在。老子以此开创了道家学派。

孔丘所关注的焦点在于社会人伦，即如何调理好人类社会自身的内部关系。

“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其外在表现形式则是“礼”。孔子的“仁”与“礼”是高度统一的：视、听、言、动皆合于“礼”，这就是“仁”。而“天下归仁”，正是孔子政治与社会思想的理想境界。可见，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与精华，就在于以“仁”与“礼”，为社会人伦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准则与规范，并以此保障了作为社会群体的人类，能够生生不息繁衍、前进。孔子由此开创了中国的儒家学派。

孙武思想学说的重心则在于，探究人类社会内部诸多对抗势力之争斗的



一般规律，尤其是集团对抗斗争的一般规律。孙武以《孙子兵法》开创了中国的兵家学派。

《孙子兵法》既是中国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又是中华文化在兵学这一特定领域的杰出代表。



第一日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这是采自《左传·成公十三年》上的两句话。原文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爓，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祀即祭祀，是礼仪；戎为兵器，指用兵。在古代，国家最重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与出兵（戎）。爓为熟肉，脤为生肉，祭祀用熟肉以供奉，出兵用生肉以祭社，从而求得神的护祐。与之相伴随的，是虔诚、恭敬，如果“不敬”，就丧失了与神交往的意义。中国上古时代，礼与兵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而礼仪（祭祀）与用兵（战争）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时交织在一起的，礼中有兵，兵中有礼。细细解读其中所蕴含的基本问题：战争决不仅仅是为了战争，战争的目的与实质都在于礼，在于道义与政治。

一、从黄帝“修德振兵”说起

中国上古关于战争的文字记载，大致以黄帝为起始。前此，先秦虽有“神戎战斧遂”（《孙臆兵法》）、“神农伐补遂”（《战国策·秦策一》）等文字，但仅此五字而已。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仅以一语“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而概括之。正因为“神农氏



弗能征”，黄帝才起而“习用干戈，以征不享”。

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代最著名的战争有两次，一是“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二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此处所称“炎帝”，并非神农氏，当是《国语》所记与黄帝为兄弟的炎帝。《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兵）以相济也。”黄、炎虽为兄弟，但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氏族集团——姬姓集团与姜姓集团，利益冲突，故“用师”以相剪灭。司马迁撰《史记·五帝本纪》，认为是炎帝首先侵袭诸侯，诸侯皆归附黄帝，黄帝这才组织力量予以反击。《五帝本纪》写道：

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黑、貔貅、貔、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轩辕就是黄帝。黄帝生于寿丘（今山东曲阜城东北），长于姬水，以“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轩辕之丘”在今河南省新郑市西北，故新郑也视为黄帝的故乡。

史传皆称黄帝有圣德，“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大戴礼记·五帝德》），既聪敏，又敦厚，故诸侯争相依附。为打败炎帝，黄帝又进一步积聚力量，“修德”在于收取民心，以争取更多的诸侯部落归附；“振兵”就是整饬军队，加强武装。黄帝收取民心的具体方略就是：依顺五行之气的运行规律（治五气），种植五谷，安抚万民，以绥静四方。在那个时代，能领导人民解决衣食之忧，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熊、黑、貔貅、貔、虎，皆为猛兽，古有“可以教战”之说。或曰，这些猛兽皆为当时不同部落的图腾，黄帝联合了这些部落，共同打败了炎



帝。阪泉，在河北省涿鹿县东，今尚有黄帝泉。经三次大战，炎帝败走，其部落之民遂融入黄帝部落，成为华夏民族的先民。

关于黄帝与蚩尤之战，有多种史籍予以载录。

蚩尤，为九黎族首领。其族初居于淮水流域，后北移，与黄、炎部落发生冲突。司马迁称，“蚩尤最为暴，莫能伐”。黄帝收服炎帝部落后，蚩尤仍不用命，“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史记·五帝本纪》）

世传蚩尤善造兵器，或为金属兵器之最初制造者。又有《龙鱼河图》之书记载：“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又，《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揭去上述载录中的“神话”外衣，由此可推断：蚩尤善为兵器，当是金属兵器的早期制造者；其所居地小的氏族部落甚多（“八十一”兄弟），联合向北流徙。文明程度显然低于黄帝，黄帝以“仁义”之行感动“天神”（实即四方民众），齐心协力，最终制服蚩尤。黄帝与蚩尤之战，一说为黄、炎之战的继续，蚩尤为炎帝臣，故继炎帝之后继续与黄帝战争。

关于黄帝时代的战争经验，《汉书·艺文志》曾著录“《黄帝》十六篇”。然其书已佚。散存于后世者，有《尉繚子》中存录的若干文字。《尉繚子·天官》曰：

梁惠王问尉繚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尉繚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



这是尉繚对黄帝军事思想与战争经验的深刻分析与理论总结。尉繚又结合三代以来的实际战争，进一步认定黄帝军事见解的正确性与可行性：

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吋（官），人事而已。”

“德”聚民心，“刑”用武力，“刑”与“德”，就是“修德振兵”。二者的有效结合，就是黄帝的才智。若依当时的社会风气，先问鬼神（先神先鬼），黄帝则是先考察一下自己的才智。历史证明，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并不在于天文星象所显示的“天官时日”，完全取决于“人事”的作为。这就是黄帝时代战争的基本经验，这也正反映了古今战争活动最根本的客观规律。

二、三代以来“以礼治军”的基本史实与理论总结

（一）“以礼治军”的由来及实质所在

数千年以来，以权谋诡诈为基本手段或基本形态的战争事实，已经使人们将“战争”与“诡诈”紧紧连在一起。讲“以礼治军”，许多人会视为“荒诞不经”，认为不可思议。此乃由长期非理性战争所形成的一种偏见。

军队的本质，是以强力手段为实现一定政治目标而斗争的武装集团。因此，军事服从于政治，军队服从于政治集团的约束与指令，正是军队自身的本质要求。一旦脱离了政治引导，失去政治方向，军队就会变成一股无法驾驭的邪恶力量，将会形成社会的灾难。而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上古时期，这种“政治方向”或“政治引导”最集中的代表，就是“礼”。

在“引言”中已经讲过，中国古代的礼制渊源甚早，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人们向神灵的祈福。现在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这种“祈福”决不是什么“迷信”，而是生存在当时的自然与社会条件之下，人们的一种无可奈何的